

卡拉扬传

(美) 罗杰·沃恩 著

HERBERT VON KARAJ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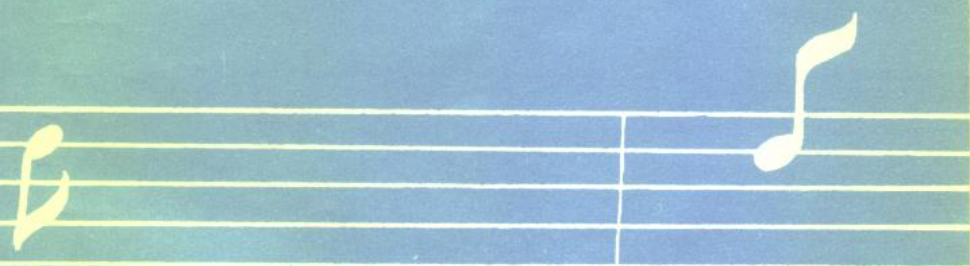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HERBERT
VON KARAJAN

by ROGER WATSON

卡拉扬传

【美】罗杰·沃恩 著
高蓉 杨明 刘永军 译
王国栋 校



群众出版社

卡 拉 扬 传

(美) 罗杰·沃恩 著 高蓉 杨明 刘永军 译 王国栋 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插页2 259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649—9/ K·15 定价: 5.40元

印数: 0,001—3,000册

Herbert Von Karajan

——A Biographical Portrait

根据美国 W·W·诺顿图书公司 1986 年版译出

内 容 提 要

卡拉扬，一个多么辉煌的名字，他不仅在世界乐坛拥有“音乐帝王”的宝座，而且在中国也几乎家喻户晓。

在这本令人着迷、内容详尽的传记中，作者披露了一些有关卡拉扬的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使我们能循着这位音乐天才成长的足迹，去追寻他那悲欢离合、不息拚搏的不凡身影，去了解他那坎坷的经历以及曲折的爱情生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主任评价本书时说：“这本书对一个世界有名的大表演音乐家进行了精彩的描写，它时而象惊险小说般扣人心弦，时而又象交响曲般激动人心。作者虽不是音乐家，但他抓住他笔下主人公——卡拉扬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神奇般的艺术创造力，并以记者的技巧向我们阐明：对卡拉扬来说，所有的道路，无论有多么曲折，都可以通向一个目标——完美。”

译者的话

1989年7月16日，世界乐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最后一个恐龙”和“音乐帝王”的德国著名音乐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卡拉扬的去世，象征着现代世界乐坛一个时代，一个指挥家时代的终结。在现代世界音乐界和音乐爱好者心目中，卡拉扬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音乐的代名词，一个神圣得让人一听到就激动得几乎要流泪的字眼；他那紧闭双眼挥动指挥棒的身影，也已经在人们记忆中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他以自己的天才和辛勤努力，建造了一个音乐王国，树起了一座世界音乐史上的丰碑。在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卡拉扬指挥过无数场音乐会和无数部世界名曲及歌剧，从他的指挥棒下流淌出来的美妙音乐，曾经使多少人为之陶醉，为之流泪，为之疯狂。他为我们奉献的音乐，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诚然，卡拉扬的音乐是不会因他的逝去而消失的；但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乃至他的风趣和幽默却必然会因此而成为过去。人们认识卡拉扬是通过音乐；而时至今日，当这位伟人已经溘然长眠的时候，每一个卡拉扬的崇拜者也许更想探寻那如行云、如流水、如飞瀑或如惊雷般美妙辉煌的音乐是怎样从他的指挥棒下流淌出来，以及他又

是怎样登上“音乐帝王”宝座的。从本质上讲，卡拉扬不是神，不是偶像，更不是音乐机器人，而是和我们相同无异的活生生的凡人。事实上他也是个现代世界乐坛上一位最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纳粹分子，音乐界的大独裁者；也有人说他指挥时紧闭双眼并不是在想音乐，而是在想钱，想飞机，想快艇；甚至更有人说乐团即使没有他指挥也同样能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是非自有公论，我们感谢罗杰·沃恩历尽艰辛，在卡拉扬还活着的时候就跟随这位大师四处奔波，搜集资料，终于写出了《卡拉扬传》，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相信在这部近似于采访录的传记中，人们一定会发现一个更完整、更现实和更生动的卡拉扬。现在，我们把它译成中文，奉献给中国的音乐界，奉献给中国的卡拉扬迷，同时也作为一份谢礼，奉献给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永恒音乐世界的赫伯特·冯·卡拉扬的亡灵。

最后，借此机会，谨向为该书中译本出版而付出巨大努力的出版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一九九〇年四月

前 言

传记体人物描写

传记有两种类型。在一种传记中，传记人物已经死去，传记作家通过对信件、个人手稿、书籍及其它有形物的研究和对了解传记人物的人进行采访，尽其所能，重新把传记人物的生活及个性清晰地勾画出来。这种传记是客观的学术作品，是历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它的优点是不必掩盖什么，即使是丑恶的东西。传记人物毕竟已经死去，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

在第二种类型的传记中，传记人物是活着的，这就是这种传记的第一大特点。与所要描写的人物进行面对面的交锋有重要的价值，是任何东西所无法取代的。当然，另一方面也有不足之处：范围会有些限制，有时还会产生极不舒服的感情失衡。个人手稿还被密存着。朋友，甚至是敌人，都还不愿意坦率地谈论这位值得为之立传的人物，因为这种人物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势，他的影响很深。而且，还有一定的礼仪规矩需要维持，需要遵守。这种给活人写的传记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传记体人物描写”，前提就是假设这种传记不完整，是一种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很久以前，写这种传记的新闻工作者就认为：无论这种传记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有活着的传记人物是压倒一切的优点。

这本书就是一本传记体人物描写。由于该书蕴含着传记人物和传记者作之间密切的合作和亲密的关系，了解该书是怎么写成的便有了一定的重要性。这样的故事往往不是被写在书的封皮上，就是被省略掉了。这是不应该的。要让这种传记体人物描写没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客观性会随着熟悉程度的增强而逐渐减少。故事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解：故事总是能揭示这一观点。

因为，知道我是以船员的身份去见赫伯特·冯·卡拉扬是很重要的。1981年，我去法国南部的圣特罗佩为《航海》杂志写一篇关于一个叫作加里·乔布森的咨询员的文章。加里·乔布森当时正在给卡拉扬讲解他的77英尺长的“迈克西”号游船的复杂结构。为了准备我们的拜访，乔布森送给卡拉扬一本我写的关于1979年快艇比赛的书，书名为《孤独的旅程》。这次比赛中，有15人在风暴中丧生。卡拉扬在一封致乔布森的信中写道：“谢谢你给我的这本沃恩先生写的书。我发觉这本书简直棒极了，请转达我的敬意。他的精确细致的描写，特别是他给约翰·基尔罗伊先生写的小传堪称写作精品。我希望有人也能为我写这么一个东西。”在我和他初次相见的前5分钟，他反复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愿望。

我最初的一个顾虑是我既不是音乐家，也不是音乐研究家；既不是音乐历史家，也不是音乐评论家。而卡拉扬是一个被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尚存的指挥家，是四岁半就可以弹钢琴的神童，是发行过约800张唱片，自1955年来一直担任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合奏乐团之一的柏林交响乐团的终身音乐指挥。要为他写传记，似乎的确有必要至少对所有的音乐分支中的一个分支比较熟悉。可是，我很快就意识到有这些

资格的人要接近卡拉扬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他一般不信任音乐界的人。他可能更愿意把利伯里斯聘为客座独奏演员，而不愿意去和一个专业音乐界人士去探讨争议任何音乐观点。

卡拉扬18岁时开始作指挥，20岁起开始作音乐指挥。50多年来，他把很多重要的交响曲指挥过100多遍，而且还对50多个歌剧剧目进行了润色。许多最长、最复杂的歌剧在他的心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甚至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不读评论，而是在音乐会后直接从指挥台回家，不要陪伴，单求孤独。到73岁（1981），他的自我已变得盲目而巨大。他不争辩，不讨论，只口授。对音乐创作他有特别的态度：他肯定他是对的。他会把音乐上的妄求者当早餐吃掉。

巧的是我是船员。卡拉扬和船员、飞行员和从事室外活动的人相处得不错。他是个从心里喜欢山的人，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中，他便感到无比的幸福。他的几幢房子分别坐落在瑞士圣莫利兹的险峻的山庄中，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安尼夫，还有在地中海边上的。在维也纳城外的一个森林中他还有一个小屋。还在孩提时，他就懂得：人们对在音乐之路上奋力攀登的人必须有信任感。他一生都在登山，滑雪，划船，开快车，开摩托，开飞机。和他熟悉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从这些方面来的，而不是来自音乐界。

但是，如果一个人对音乐一窍不通，也是无法接近卡拉扬的。幸运的是我懂音乐。我9岁时开始弹钢琴。11岁时，我问父亲能不能给我搞到一个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相爱在今宵》的乐谱。他回家时带回的乐谱很有名，可我不知道怎么念作曲家的名字。《我们相爱在今宵》的主题是直接来自彼得·伊利伊奇·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抄袭来的。

这个曲子至今还是我最喜爱的音乐之一。

我坚持上了5年的音乐课，还参加了在当地的妇女俱乐部举办的可怕的学员演出会。由于我有自然的节奏感和一副好耳朵，后来又转学爵士乐。在大学时，我还选修音乐课，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听交响乐的乐趣。

我是个音乐爱好者，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能演奏。1978年我采访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100周年纪念会，这是我第一次写音乐方面的文章。那篇文章使我后来得以陪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在1979年访问中国。这次中国之行最重要的事是我结识了音乐指挥西济·奥扎瓦，一个迷人而又才华横溢的人。他是赫伯特·冯·卡拉扬的学生。

所以，当我坐在卡内基音乐厅里聆听由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由卡拉扬指挥的所有排练和四场音乐会时，真是既惊奇又快乐。

写于牛津及马里兰

1985年3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传记体人物描写	1
第一章 辉煌的纽约之行	1
第二章 阴雨连绵的萨尔茨堡复活音乐节	37
第三章 传奇般流浪冒险的开端	127
第四章 登上音乐帝王的宝座	213
第五章 重返维也纳	271
第六章 最后的《蔷薇骑士》	301
第七章 纪念碑	343

第 一 章

辉煌的纽约之行

1982年10月

卡内基音乐厅已被卖掉六个月了。柏林交响乐团也有六年没有来纽约演出了，但仅仅是这个要来纽约演出的传闻已经使卡内基音乐厅售票处的电话交换台繁忙不堪，热得发烫。赫伯特·冯·卡拉扬与柏林交响乐团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27年的音乐，他们已无法分割。他们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他们要来纽约演出的广告画刚在卡内基音乐厅外面的广告栏贴出，“票已售完”的黑字白纸的纸条也跟着贴在了广告画的旁边。广告上的票价每张超出35美元，票贩子在外面把票价抬到200至300美元。这是该周，也许是该月纽约最贵的票，是全年最贵的音乐会票。

卡内基音乐厅内部也有一个问题。刚排练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阿波罗》的几个小节，赫伯特·冯·卡拉扬就停止了排练，坐在凳子上，盯着空空荡荡、昏昏暗暗的大厅，等候一位可以商量解决此事的助手。一个人朝升高的台子跑去，然后人们一个接着一个都朝舞台跑去，个个都伸长脖子，想和高高地站在舞台上的卡拉扬说话。

问题出于有噪声。赫伯特·冯·卡拉扬听到有噪音，很

不高兴。他举起一只手，人群静了下来，等着听他说话。卡拉扬说：“有点那个……，你们听到了吗？”他微笑着，就象是父亲给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一样。噪音很小，从来都这么小，但是，他们听到了噪音。怎么办呢？他们要检查一下。卡拉扬说，如果噪音与乐器的声音能合拍的话，他是不会抱怨的，可是它们不合拍。助手们笑了。他说他觉得对地铁偶然发出的隆隆声是无能为力了。助手们也不大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他们也这样认为。卡拉扬问地铁是什么时间修的，音乐厅又是什么时间修的，最后说他怀疑这是一个糟糕的规划。随后，他坐在凳子上，把身体转向乐团，集中演员们的注意力，用一个小手势把助手们打发走了。他对演员说：“就这样吧！”然后举起指挥棒，嘴里还咕噜了一串德语，把演员全逗笑了。排练继续进行，这不是说排练非常必要。斯特拉文斯基的《阿波罗》是弦乐组最能露脸的作品，也是有经验的演员们最熟悉的作品。在跨大西洋飞行后，卡拉扬还没有消除旅途疲劳。

卡拉扬已73岁高龄，背部情况不断恶化，经常疼痛，但表面上，他看起来还蛮好。他的右腿总是僵直地拖在后面，走起路很吃力。可是在乐团面前，他似乎很安然，放松，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他很机敏，很潇洒，面部的皱纹深深的，很有点贵族气派，反映出他有希腊血统。他橄榄色的皮肤要比同龄人的皮肤光滑，花白的、已近乎全白的头发梳成背头，好像是刚结束了一场滑雪比赛。卡拉扬的身材并不高，大约才5英尺6英寸高。他这一副健壮结实的身躯是一生体育锻炼的结果。他具有他那样年纪的人所罕见的虚荣心。他严格地注意自己的饮食，至今也没有变得大腹便便，尽管这种

趋势已日益难以避免了。过去，大家都说卡拉扬“精神抖擞”。现在，虽然已73岁，这种评语对他还仍然适用。

他开始排练时有这么一个习惯：先用目光横扫所有的座位，和乐团的十几个人交换一下眼神，轻轻地点点头，弄清大厅里没有不速之客，然后才开始。他在大歌剧院排练时穿的衣服要比在家时穿的那身无精打彩的衣服高级一点，一条法兰绒裤子；一件黑色的开司米高领毛衣，毛衣的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上；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的袋鼠皮做的高筒鞋，是奥地利阿迪达斯公司为他特制的。

中场休息时，卡拉扬得到了一份关于噪音的报告。原来，在大厦的地下室里有一台水泵把水抽到楼顶的一个水箱，从那里再把水分送到大厦上面各层的140多户住宅中。大厦经理麦克瑞先生说卡拉扬听到噪音的那一阵他在台上走。麦克瑞讲，他从前从未听到过噪音，这也许是由于他在纽约住的时间太久了，对噪音已经习以为常了。大家一致认为排练时水泵应该关掉，当然，音乐会时也要关掉。麦克瑞说他希望大厦不会断水。

至于地铁，就是赫伯特·冯·卡拉扬也毫无办法，无论如何如何在纽约不行。如果这个情况出现在奥地利——在奥地利，人们把卡拉扬当做一种自然资源，即民族英雄——而且假若奥地利有地铁，并且地铁又刚好从音乐厅下面通过（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卡拉扬可以在音乐会演出期间关闭地铁，一点问题没有。在萨尔茨堡也肯定能办到，在维也纳也有可能办到，因为至今维也纳人还谈论卡拉扬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时的“卡拉扬年”，而且谈论时的语调极其严肃，简直跟谈论战争时的语调没有两样。在柏林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因

为他在柏林掌管近30年的音乐命运：在日本是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在日本已被神化了。

著名指挥家和教师马克斯·鲁道夫说：指挥家有权利感觉重要一些。“他们毕竟要重现音乐名曲。”绝大多数的指挥家，至少是那些好指挥家，都在想方设法用大量的权力来加强他们的重要性。权威在指挥职业中必不可少。试想想：剧场里有成百号人的乐团，演员们有的闲聊，有的调乐器，有的打鼓，有的拉乐曲，还有些说笑话；而且还有两千多人在就座，放衣服，翻节目单，朝朋友招手，说话，咳嗽。一个人走了进来，全场顿时肃静，他举起一根小白棍，便是一片死寂，接着便会奏出愉快美妙的乐曲。霎时间，混乱消失，秩序井然。这种对一个人的出现所产生的如此巨大的反应是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都无法承受的，无法不受到影响。从事指挥本来就必须具备的巨大的自我在这里又被进一步扩大了。于是，幻觉产生了。根据指挥家个人的本质和稳定性，他们的自我形象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失控。

卡拉扬的出身差不多可以算是显贵了，所以他有一种让别人屈从于他的本性。名字中的“冯”字是家族的头衔——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弗利德里克·奥古斯公爵授与他的曾祖父乔治·约翰·卡拉扬尼斯的。他的曾祖父曾为德国的纺织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卡拉扬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继承了这个头衔。在今天的奥地利，头衔是不合法的，可是有头衔的大家仍可以继续使用他们的头衔，什么麻烦也没有，这种矛盾是奥地利式处理问题的最好例证。

卡拉扬是音乐天才，6岁时就在音乐会上演奏莫扎特的回旋曲，而他的权力主义观点也似乎是和他的音乐天才一同

与生俱来的。因而，让卡拉扬习惯权力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卡拉扬的权力值得研究是因为他象征着一个指挥家时代的终了，他被称为最后一只恐龙。当今的年轻指挥家总是同时干很多工作，好高骛远，坐着飞机到各地去做国际职业客座指挥，而不象卡拉扬那样，在柏林（还有萨尔茨堡和维也纳）建立自己的权力根据地。在20世纪后期，通过组织变革和参加工会，乐团演员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使指挥家不再象从前那样专制了。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指挥埃里奇·莱因斯多夫在他的《作曲家的鼓吹手》一书中回忆说：1937年他第一次到美国时，“无线电城音乐大厅的音乐家一看到指挥家用右手打节拍时伸出左手的两个指头就明白自己接到离职通知了。指挥的那个手势意味着这位可怜的音乐家的受聘期只剩两个星期了。任何一位指挥都有权把任何一个乐曲录一遍，甚至是录第三遍的时间也已经不复存在了。1937年卡拉扬开始剪录音唱片时，这方面的收藏品非常少，他录的交响曲唱片可能成了唯一的版本。他也具有估测录音业前景的眼光——按他的说法是“嗅觉”。和他同时代的音乐家们把在唱片上录名曲当成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唯恐避之不及，而卡拉扬则不仅在这种事上热情饱满，而且在电子录音发展的每一重要步骤都捷足先登，如慢转密纹唱片、立体声、四音声及现在的集成（激光）磁碟。

卡拉扬的权力在50和60年代时影响深远。他是柏林交响乐团的音乐指挥，拉斯卡拉的艺术顾问，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艺术指导，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艺术指导，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他完全有理由被称之为“欧洲的音乐总指导”。那时候，谁都想弄到一盘卡拉扬的唱片，这对他简直太棒了。战